

刘达科
注评

辽金元 诗选评

名家
注评
古典
文学
丛书

三
家
注
评

本书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项目

刘达科 注评

辽金元

诗选评

名

家

注

评

古

典

文

学

丛

书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辽金元诗选评 / 刘达科注评. —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4.7

(名家注评古典文学丛书)

ISBN 7-80628-856-2

I. 辽... II. 刘... III. 古典诗歌—文学评论—中
国—辽宋金元时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6102 号

名家注评古典文学丛书

辽金元诗选评

	刘达科	注评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31 号	
电 话	(029)87205106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西安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12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628-856-2/I·171	
定 价	18.00 元	

名家注评古典文学丛书

学术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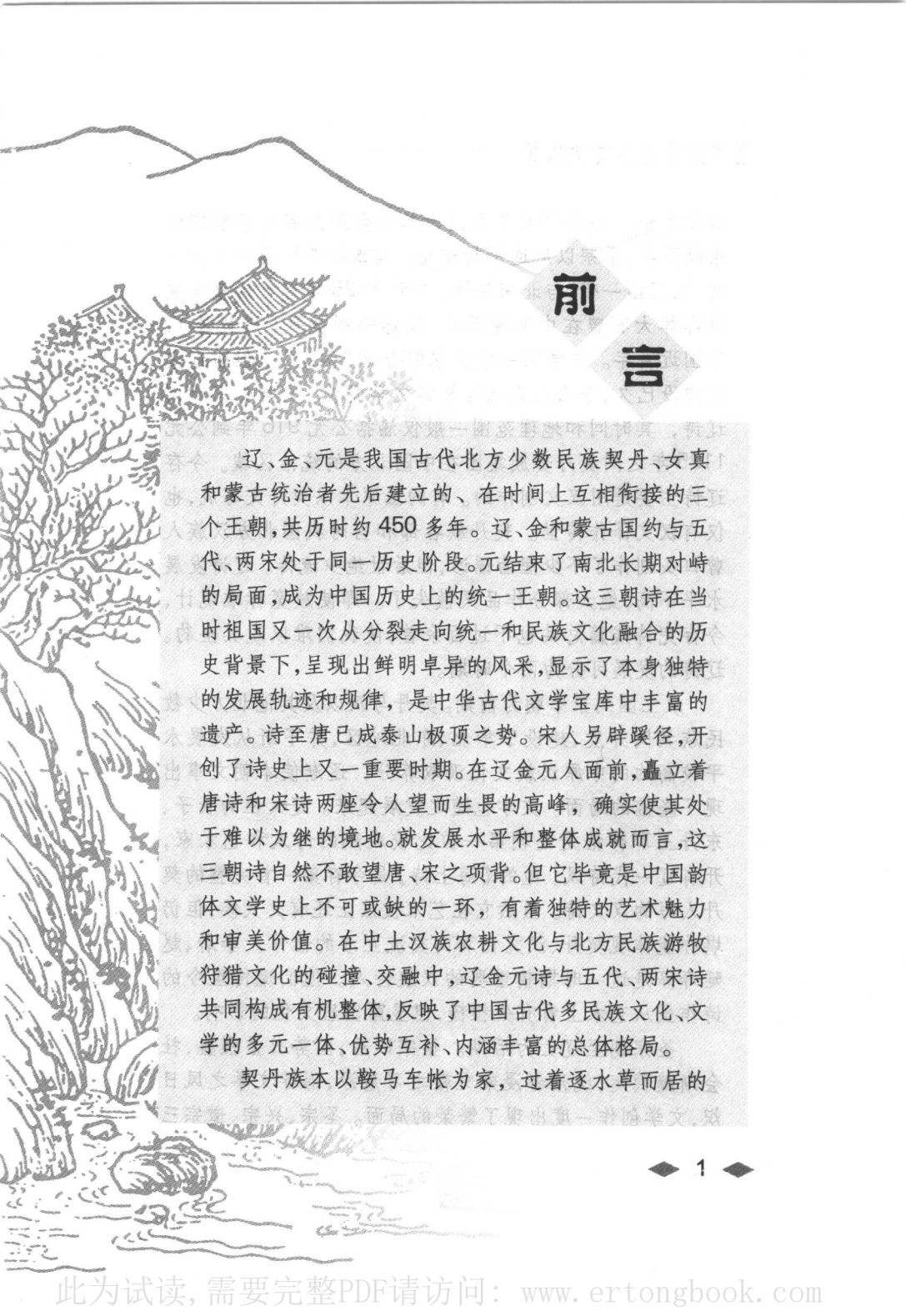
王运熙 王水照 钱仲联 袁行霈

郭预衡 曹道衡 傅璇琮 褚斌杰

编辑工作委员会：

傅璇琮 王水照 陶文鹏 魏全瑞

薛瑞生 阎琦 淡懿诚



前言

辽、金、元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契丹、女真和蒙古统治者先后建立的、在时间上互相衔接的三个王朝，共历时约450多年。辽、金和蒙古国约与五代、两宋处于同一历史阶段。元结束了南北长期对峙的局面，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统一王朝。这三朝诗在当时祖国又一次从分裂走向统一和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背景下，呈现出鲜明卓异的风采，显示了本身独特的发展轨迹和规律，是中华古代文学宝库中丰富的遗产。诗至唐已成泰山极顶之势。宋人另辟蹊径，开创了诗史上又一重要时期。在辽金元人面前，矗立着唐诗和宋诗两座令人望而生畏的高峰，确实使其处于难以为继的境地。就发展水平和整体成就而言，这三朝诗自然不敢望唐、宋之项背。但它毕竟是中国韵体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在中土汉族农耕文化与北方民族游牧狩猎文化的碰撞、交融中，辽金元诗与五代、两宋诗共同构成有机整体，反映了中国古代多民族文化、文学的多元一体、优势互补、内涵丰富的总体格局。

契丹族本以鞍马车帐为家，过着逐水草而居的

游牧生活，公元916年立国时其社会形态尚处于早期奴隶制阶段，圣宗以后逐渐封建化。其南疆曾扩展到今白沟河、雁门山一带，与北宋邻境。公元1125年辽亡后皇室成员耶律大石曾在中亚建西辽，又称哈刺契丹（黑契丹），享国近百年。史学家一般将它们合称“两辽”。但西辽文献湮没已久，今人已无从考知其文学概貌。文学史家所谓辽诗，其时间和地理范围一般仅涵括公元916年到公元1125年之间契丹贵族集团在中国北方的统治区域。今存辽诗主要是用汉文创作的。有的虽原本以契丹文写成，也仅有汉文译作传世。契丹族各部和当时我国北方汉族人曾口头创作了不少俚曲谣谚，但后世绝少流传。辽诗发展水平不高，绝大部分作品又散失了。即使放宽标准统计，今存完诗残篇总共也不过百余首，使我们难以窥其全豹。辽诗的发展可分为两个时期。

从立国到景宗朝为前期。契丹与汉以及其他北方少数民族共同开发、建设了华北、东北地区，并不断从发展水平较高的中原汉族文化汲取养分，逐渐使本朝文事出现了隆盛的局面。文学也随之发展起来。辽太祖的长子、东丹王耶律倍是辽朝第一位比较成熟的诗人和艺术家，开有辽一代诗风。他的《海上诗》是今存第一首完整的契丹人写的汉文诗。虽然它在艺术技法上还有欠火候，但仍堪称能体现契丹、汉文化双向交流互渗的佳作。李瀚、赵延寿等是这一时期较重要的汉族诗人。他们流传至今的诗作虽从艺术上看有失粗糙，但显露出唐文化的影响。

圣宗朝至辽亡为后期。圣宗以后，国势日益强盛，社会渐趋稳定，统治者浸染文翰之习愈深，倡导文学之风日炽，文学创作一度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圣宗、兴宗、道宗三

位帝王都精通音律，雅好词翰，有诗作传世。道宗耶律宏基是辽代帝王中濡染汉文化最深的一位。其《题李俨黄菊赋》经营巧妙，意象空灵，含蕴无穷，是本朝绝句中不可多得的佳篇之一，标志着辽诗和辽绝句的成熟。契丹贵族中出现过不少淹通风雅善诗能文者。此时的汉族士子亦不乏在诗歌创作方面成就显著者。士子中以诗文名世者尤多。辽朝闺阁多才，妇女作家极为后人瞩目，契丹族女作家、道宗的妻子萧观音是其中佼佼者，代表当时的文学创作水平。今存惟一的辽代纪实小说、王鼎的传记文学作品《焚椒录》记载了辽代最杰出的女作家萧观音的生平，录其全部今存诗、词、文作品。辽末天祚朝，社稷倾覆之际，出现了萧瑟瑟忧国伤时的诗篇。汉族文人虞仲文、马植等也在此时或亡辽后写过一些诗。

辽诗中可称之作还有生活年代无可考的寺公大师的长诗《醉义歌》。它本以契丹文写成，今存者乃元初耶律楚材所译。它是辽代契丹文文学发展水平的突出标志之一，当代论者称其为辽诗之冠冕。流行于当时契丹族和汉族的俚曲谣谚今存虽已寥寥，但仍能折射出辽人口头创作的面貌。

女真族是生活在中国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古老民族。它建国前尚处于原始氏族社会初步向奴隶制的转变时期，生产、生活方式以狩猎畜牧为主。公元1115年正月，女真首领、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在今黑龙江阿城县南称帝建国，号大金。公元1125年金灭辽，次年灭北宋。公元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从上京（今阿城县白城子）会宁府迁都燕京（今北京），并于公元1161年，定燕京为中都，使政治中心南移，加速了女真封建化的进程和南北文

化交流融汇的进程。世宗、章宗是金朝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女真社会也逐步完成了向封建制生产关系和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的转变。公元1164年宋金议和成功,长期无战事,社会较为安定。但章宗后期到卫绍王时,社会弊端开始显露,内外矛盾逐渐尖锐。公元1214年蒙古入侵,金室被迫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20年后,蒙古亡金。金享国119年,与南宋长期对峙。其版图最大时南疆推进到今淮河。

金朝文事远较辽朝为盛,金诗的发展水平也远远超过辽代。诚如《金史·文艺传》所说:“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流传至今的金诗作品也大大多于辽朝。今存诗作大多为汉文作品。

金诗所继承的最直接的文化遗产是辽、宋诗。北宋诗歌传统对金诗的影响尤其深刻、明显。元好问说:“百年以来,诗人多学坡、谷。”(《赵闲闲书拟和韦苏州诗跋》)明人王世桢说元好问选金诗编《中州集》,“其大旨不外苏、黄”。(《艺苑卮言》)清·顾奎光也说:“金诗宗尚不出苏、黄。”(《金诗选》凡例)古人对金诗体貌的概括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苏轼和黄庭坚的诗作集中代表了宋诗的审美形态和艺术范式。整个有金一代,“苏学盛于北”(翁方纲《石洲诗话》),苏轼的文学思想对诗界的影响极其巨大,追随、围绕黄庭坚的一大批诗人形成的江西诗派的流风贯穿始终。金初许多诗人以学苏、黄为审美价值取向。这一思潮逐渐分化为推崇自然雅洁和追求新奇尖巧两种主要倾向。发展到中、后期,出现了不少反思本朝诗进展历程的经验和教训,审视苏、黄对金诗发展的正面

和负面影响的诗坛大家,如赵秉文、李纯甫、王若虚和元好问等。

金诗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

前期,包括太祖到海陵王四朝。人们常用“借才异代”概括金前期诗坛的情况。实际上此说并不能完全准确地概括这一时期的情况。此时诗坛,就北宋而言,或可说是“借才异代”,但就南宋而言,或许称借才于“异朝”、“异国”或“异地”更为合乎实际。近人吴梅曾有“借才异国”之说(《辽金元文学史》)。由辽入金的文人主要有韩昉、左企弓、虞仲文、王枢、张通古和邢具瞻等。其诗歌创作成就比不上由于各种原因留在金国的宋儒们。由宋入金的文人很多,较著名者有宇文虚中、张斛、滕茂实、朱弁、洪皓、蔡松年、高士谈、吴激、马定国、祝简、孙九鼎、施宜生、刘著和晁会等。虽然其中有些人未仕金,也有些人入北后又南归,但他们在北方写下的大量的诗作,从独特的角度反映了金朝社会生活和历史内容。与此同时,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女真皇族中产生出一些能诗者。第四代国君完颜亮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他们与汉族作家的创作形成鲜明对照,为金诗的发展走向注入了新的因子和趋动力。宇文虚中是金前期的诗坛盟主。这一时期诗作的引导主题由两大基调组成,即抒发去国怀乡的悲凉情思和崇尚高情远韵的隐逸心态。宇文虚中和吴激等人代表前一种倾向,蔡松年等人代表后一种倾向。

公元1161年世宗即位到公元1214年金室南渡之前为金诗发展的中期。金世宗登基标志着金朝进入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至章宗朝“文治已极”(金·元好问《通玄大师李君墓碑》)。金诗也于此时走向成熟,“国朝文派”

诞生。国朝文派又称中州文派、唐宋文派或金源文派。这一称谓最早由金中期文学家萧贡提出，赵秉文和元好问予以确认。蔡松年之子蔡珪是国朝文派的第一位重要作家，有国朝文派“正传之宗”之号。党怀英是继蔡珪之后主盟诗坛的又一著名作家。同时的重要诗人还有王寂、刘仲尹、刘迎、赵沔、王庭筠、周昂、萧贡等一大批人。金末元初的大文豪元好问之父、诗人元德明也生活在这一时期。金后期文坛盟主赵秉文此时也崭露头角，颇负文名。世宗、章宗亦能为诗，其作词藻典丽雍容，帝王气味极浓。在官庭诗人中滋长了追求尖新、浮艳风气的不良倾向。这时出现了很多道士诗人如王喆、马钰等。金中期诗是这50年间“字内小康”（《金史》章宗纪）社会现实的反映。其基调以歌颂升平景象和吟咏闲适生活为主。金前期蔡松年代表的创作倾向到世宗时成为诗坛的主导思潮。同时，由于女真文化与汉文化的相互渗透、影响，本时期诗坛又呈现出清刚雄健、质实贞刚的面貌。金中期出现的反映生民疾苦和走向齐物达观两种思想成为金末诗风改革的先声。国朝文派的先后几位领袖人物和众多重要作家都各自形成了本人的风格，呈群星璀璨、气象万千之态。国朝文派“正传之宗”（《中州集》小传）蔡珪的诗风突兀崛奇、豪宕峭健；“大定、明昌文苑之冠”（清·英和《金文最》序）王寂的诗风清刻隽露、超逸健拔；继蔡珪主盟文坛、曾与南宋词坛泰斗辛弃疾同窗的党怀英的诗风清远冲淡、穷幽极玄，体现了明昌文坛刚柔相济、清真淡宕的特色；“文彩风流，照映一世”（《中州集》小传）的王庭筠往往在萧散恬淡的诗句里和高朗明净的诗境中隐含着一种深沉的人生感慨和幽独意识……。南渡以后主文盟

者赵秉文此时也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

在蒙古军队的侵逼下，金廷于贞祐二年被迫南渡黄河，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市）。大批文人也迁播到今河南、陕西、山东等地。金诗的发展进入后期。1234年金朝虽亡，但活跃在中国北方诗坛上的仍是元好问等一大批金朝遗民。因此，有人把金后期诗的下限延长到公元1257年元氏辞世，甚至截至蒙古灭南宋。“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清·赵翼《题遗山诗》），在中原板荡，国势艰危之际，诗坛却出现了空前繁盛的局面。由于客观现实的激发，有志之士矫尖新浮艳文风之弊，起衰振拔，文学风气为之一变，感慨悲壮之音、质朴刚健之风成了诗坛的主旋律。金中期以后诗坛的不良倾向与宋江西诗派末流的影响有关。此时，诗人们自觉地总结近百年来学苏、黄的得失，力矫江西末流带给金诗的弊端，以宗唐复古、转益多师相号召，拨乱反正，纠宋诗之积弊。金人刘祁总结说：“南渡后文风一变，文多学奇古，诗多学风雅。由赵闲闲（赵秉文）、李屏山（李纯甫）倡之。……赵闲闲晚年诗多法唐人李、杜诸公，然未尝语于人；已而麻知几（九畴）、李长源（汾）、元裕之（好问）辈鼎出，故后进作诗者争以唐人为法也。”（《归潜志》）元人王恽也指出：“金自南渡后，诗学为盛，其格律精严，辞语清壮，度越前宋，直以唐人为指归。”（《西岩赵君文集序》）

文坛耆宿赵秉文和文学思想带有异端色彩的李纯甫是南渡后的文学界领袖，对金末诗风的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外，著名学者兼文学家王若虚的诗论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赵秉文以金代大儒自居，有“礼部天下士，文盟今韩、欧”（杨云翼《李平甫为裕之画系舟山图，闲闲公有

诗,某亦继作》)之誉。他倡导风雅传统和宗唐得古的诗学主张,积极从诗经和魏、晋、唐、宋诸朝诗汲取艺术营养,为诗界带来了生机。在这一总的前提下,他又强调:一、转益多师,由于“古人各得其一偏”,因此应“尽得诸人之所长”;二、抒写“吾辈胸中之妙”,把师古与表现性灵结合起来(以上《答李天英书》);三、师法自然,“因事遣辞,形吾心之所欲言者”,“辞以达意而已”(《竹溪先生文集引》)。他在倡呼师古的同时又明确表示“文章不蹈袭前人最是不传之妙”(《跋山谷草书》)。他作诗不拘一体,诗风不拘一格,在各种诗体的创作上都很有成就,七古学李白,五古学阮、陶,同时又心仪王、孟、韦、柳,七绝受杨万里影响很深。李纯甫得佛学沾丐甚深,并不畏士论。在文学创作上主张师心,诗于唐人师法卢仝、李贺,近、当代推举黄庭坚、王庭筠,诗风纵横排奁、恣肆险怪、雄奇简古。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尚奇诗派。在师古这面大旗下,赵、李的文学见解亦时相齟齬。他们对学苏都无异言,争论的焦点在于对黄庭坚诗的褒贬。在上述两大派别之外,王若虚独树一帜,为诗以白居易为宗尚。他从自然为本之说出发,主张“天生好语,不待主张”,浑然天成,不假雕琢,不以辞害意,不有意求工,不刻意求奇,惟求当理,“随其所自得而尽其所当然而已”(《漳南诗话》)。他直接批评苏、黄的言论在当时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金末作家群如众星璀璨,除上面已提及者外,有代表性的还有南渡后与赵秉文迭掌文柄、时号“杨赵”的杨云翼,金世宗之孙、有“百年以来宗室中第一流人”(《中州集》卷五小传)之称的完颜珣,还有李俊民、辛愿、王郁、

王元粹、刘从益、赵元、李汾以及河汾诸老等。他们中不少人金亡后仍在世，继续从事创作。

鲜卑族后裔、赵秉文的门生、金元之际的大文豪元好问代表金诗艺术的巅峰，国朝文派辉煌的终结。他又是开有元一代文学风气的人物，无愧于“一代宗匠”（元·郝经《遗山先生墓铭》）、“两朝文笔”（元·杨鹏《送元遗山》诗）之称。人们历来对他评价甚高。元人郝经说他“独以诗鸣，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苏黄氏”（《遗山先生墓铭》）。清人李调元说他“诗精深老健，魄力沉雄，直接李杜，能并驾者寥寥”（《雨村诗话》）。清人刘熙载进一步指出：“金元遗山诗，兼杜、韩、苏、黄之胜，俨然有集大成之意。”（《艺概》）元好问是迄今传世作品最多的金代作家，存诗 1400 多首。其诗作涉及的社会内容非常广泛，但最能代表他的诗歌艺术成就的当推写于金亡前后的“丧乱诗”。这些作品悲壮而雄浑、“挟幽并之气”，堪与杜甫“安史之乱”期间创作的有“诗史”之称的诗篇媲美。元好问对古体、近体皆擅长，但最能反映其创作水平的是七律。其丧乱诗大多数是七律。清人赵翼说其“七言律则更沉挚悲凉，自成声调”（《瓯北诗话》）。元好问在《论诗诗》及其他有关撰述中对以苏黄为代表的宋诗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考察、辨析和反思，提出了较系统的诗学观，并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将金代诗学推向辉煌的顶点。

蒙古族建国前，也经历了很长的发展时期。公元 1204 年，铁木真最后彻底征服了本部落内其他势力和相邻各部，统一了蒙古高原。1206 年，在斡难河源举行忽里台（蒙古语“聚会”之意，元代汉译“大朝会”），蒙古乞颜

氏贵族铁木真被诸贵族推选为大汗，尊号成吉思汗，建大蒙古国。1234年，灭金。1235年，蒙古太宗窝阔台迁都哈喇和林（遗址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北杭爱省厄尔德尼召北）。同年又发动了灭宋战争。在不断的征服战争中，蒙古控制了亚欧两洲的广大地区。1260年，忽必烈即位于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建元中统。1264年，改燕京（今北京）为中都，进一步将政治中心南移，并遵用汉法。1271年，改国号大元。次年，升中都为大都。1276年，攻占南宋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市）。1279年，最后扫灭了流亡在广东新会海中崖山的南宋残存政权，统一全国。1368年，亡于明。元顺帝退居漠北后，仍以元为号，史称北元。史学家有时以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八年（1271）改国号“大元”为断，将元代划分为蒙古国和元朝两个时期。它作为朝代，可从其建国或改号大元時計，存在162年或97年；作为时代，则可从灭金统一北方算起，历时134年，或从灭南宋统一全国计，历时89年。蒙古族长期以来流行着用本族语言创作的民间韵语文学，灭乃蛮部统一蒙古高原后，又借用乃蛮人所使用的畏兀儿字母书写蒙古语，蒙古文字从此产生。从此有了自己的书面文学。但元代汉文诗创作实肇始于1214年陷金中都得耶律楚材等金国文臣。

对元诗分期，人们历来看法不一。这些观点可大致归纳为二分法和三分法两种，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在具体时间断限的问题上都存在歧说。总体来看，蒙古灭金统一北方后的数十年间，活跃在诗坛上的是由金入元或出生于金亡后的北方文士。其中成就最著的作家有耶律楚材、刘因、郝经等人。统一全国后，一大批宋朝儒士又为诗坛

增添了新的生力军。戴表元、方回、赵孟頫、仇远等人是由宋入元的诗人中代表性作家。南北文人际会，给诗坛带来众派汇流、异彩纷呈的气象。成、武、仁三宗时诗歌创作出现了繁荣鼎盛的局面，追求雅正成为诗学主潮，出现了号称“元诗四大家”的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与此同时，众多西域少数民族文学家如萨都刺、马祖常、迺贤、余阙、丁鹤年等相继登上诗坛，标奇竞秀，开创了中后期诗歌创作的新格局。诗风清丽的萨都刺和诗境怪谲的杨维桢有超人的天才和艺术创造力，开启元季诗风，将元诗推向新的境界。在杨维桢周围形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铁崖诗派”。丁鹤年是元诗的杰出后劲。

元代为古代诗歌发展提供了不少新的东西，并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将这一诗体的创作推向新的水平。

首先，元代是题画诗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宋元是我国古代绘画史上的黄金时期，元代的地位尤重于宋。明·张丑说：“近世谈画，例推元人为第一。”（《清河书画表》）题画诗的成熟和鼎盛也在元代。元代产生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画家诗人群体，出现了一大批诗画兼擅的艺术家，如赵孟頫和管道升夫妇、王冕、倪瓒、王蒙等。元代题画诗之多成为我国诗史上一个较突出的现象。文人们无论自己作画还是在观赏他人画作时，喜欢挥毫题诗于画面以抒写感受。诗意与画境水乳交融，重构为一个浑成圆融的艺术整体。后人对元代题画诗的评价很高。清人翁方纲说：“元人自柯敬仲（九思）、王元章（冕）、倪元镇（瓒）、黄子久（公望）、吴仲圭（镇）每用小诗自题其画，极多佳制。此外诸家题画绝句之佳者指不胜数。”（《石洲诗话》）元末倪瓒、顾瑛等代表本朝题画诗的高峰。清人

王士禛称倪“每作画必题一诗，多率意漫兴”，又谓顾题画诗“风致不减云林”（《香祖笔记》）。

其次，反映边塞生活题材之作的思想内容和审美品格也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变化和发展。唐、宋人的边塞诗或描绘剑拔弩张的战争场面，冲满干云豪气；或表现缠绵悱恻的乡思别愁，基调凄怆哀怨；或批判穷兵黩武，情绪激愤痛切。而元代的边塞诗则显示出新的格局。它以反映边土风情和民族习尚为主旋律，表现了人们对塞外生活的热爱和向往，充满民族融洽的祥和气氛，流露出亲切、欢快、积极向上的倾向。这样的作品诞生在多民族、大一统的元帝国时期，显示出独特的历史文化意义。

再次，元人还写了大量的竹枝词，进一步增大了绝句这一诗体表现社会生活的包容量。元代文人创作的竹枝词上承南朝乐府吴声歌、西曲歌和唐代刘禹锡《竹枝词》的艺术传统，同时又借鉴、吸取本朝民歌的创作经验和艺术养分，大大拓展了表现内容。诗人们不再仅仅利用这一形式反映怀春、思亲和旅愁，而将其描写的涵盖面延及咏吟风物之胜和人物之美，乃至揭露社会矛盾，表现下层人民的疾苦与呼声。杨维桢《西湖竹枝词》和《海乡竹枝歌》等堪称这方面的典范。

再次，元人的官词、套体诗和咏物诗等类题材的诗作也有突破前人窠臼之处。官词表现宫廷生活，唐代王建、顾况较早写此类作品，后世继之而作者很多。辽金人在官词创作方面成就不大。较可观者仅有刘著《官词》等寥寥数首。元延祐以后，诗人写官词成风，虞集、王逢、萨都刺、柯九思、张昱、乃贤等人的官词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萨都刺在这方面的成就最著称。其《四时官词四首》用了

七律组诗的形式,打破了官词历来用七绝的常格。萨都刺还有些官词所写并非宫廷实事,想象和虚构成分较多,因此有人称这类作品为拟官词。这都是元人为官词发展作出的新贡献。杨维桢认为,“官词”是“诗家之大香奁”,赋于这一诗体更新的内涵。奁体诗由晚唐诗人韩偓《香奁集》而得名。韩集所收大都为描写妇女美貌、生活或男女偷期的诗作。嗣后,香奁体成了淫艳诗体的代名词。正统意识浓厚的文人对此类诗深为忌讳。而元人思想较为开放,沉沦下僚的文人对这一诗体更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力矫这一偏见。元末杨维桢不但写了大量的奁体诗,而且在其《续奁集二十咏》序中旗帜鲜明地宣称:“陶元亮赋《闲情》,出替御之词,不害其为处士节也。予赋韩偓续奁,亦作娟丽语,又何损吾铁石心哉!”由于元代一大批摆脱传统观念束缚的进步文人的努力,终于使这类题材的作品在正统诗文的大雅之堂有了一席之地。元代咏物诗的气势和规模也大大超过前人,并出现了像冯子振、释明本的《梅花百咏》等咏物作品专集。

再次,元代还涌现出一大批西域少数民族诗人。清人顾嗣立谈及这一情况时数举作家说:“元时蒙古、色目子弟尽为横经,涵养既深,异材辈出。贯酸斋(云石)、马石田(祖常)开绮丽清新之派,而萨经历(都刺)大畅其风,清而不佻,丽而不缛,于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之外,别开生面。于是雅正卿(琥)、达兼善(泰不华)、迺易之(贤)、余廷心(阙)诸人,各逞才华,标奇竞秀,亦可谓极一时之盛者欤。”(《寒厅诗话》)众所周知,由于元末杨维桢的倡导,竹枝词风行一时,而马祖常实乃开此风气的先驱者之一。其流传至今的诗作,明确标以